

【文化谐音】

□陈炎

眼下“幸福”一词颇为时髦,央视记者拿着麦克风满大街地追问行人:“请问你幸福吗?”于是便引发出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答案。有人说:“我如今吃不愁、穿不愁,能说不幸福吗?”有人说:“如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怎么可能幸福?”有人假装不懂地回答说:“我不姓福,我姓张!”有个捡破烂的老头被问了三遍,记者的嗓子都喊破了,可总是嚷嚷道:“大声点儿!你说什么?”待那记者无奈地走后,老头却说:“我早就听见了,累死你个鳖孙子!没看见我在捡破烂吗,还幸福什么?”

可话说回来,其实那记者也没做错什么。因为幸福是一个主观色彩很强的概念,叔本华不是说过吗:从皇宫里看落日与从铁窗里看落日,所获得的幸福感应该是一样的。因此,捡破烂的老汉不见得比那些豪门权贵更缺少幸福感,或许他这会儿还在为曾经奚落过那位记者而偷着乐呢!把鲁迅先生的话反过来说:尽管煤油大王不曾体会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辛酸,然而捡破烂的老汉也绝无投机商人开交易所折本懊恼!穷人固然比不上富人的生活质量,可富人也未必比穷人更加幸福!那么,究竟什么是幸福呢?

【书法茶座】

□杨加深

说幸福

在我看来,一个人幸福与否,并不等同于他的生活质量,而是取决于他将事业与职业统一起来,将友谊与同事统一起来,将爱情与婚姻统一起来的程度。

就一般的中国人而言,我们一生中都有三样不得不做的事情,那就是寻找职业、结交同事、组织家庭。职业是我们赖以谋生的工作,没有职业我们就没有了生活来源;同事是我们不得不打交道职业伙伴,没有了同事我们就很难独立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家庭是我们必须组建的社会细胞,没有家庭我们就无法生儿育女……与此同时,就一般的中国人而言,我们一生中又都有三样渴望获得的东西,那就是事业、友谊、爱情。事业是实现我们人生理想的途径,只有在事业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呈现自我的价值;友谊是与志同道合者的精神纽带,只有在友谊中才能够全方位地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爱情是我们愿意为之付出的情感,只有在爱情中才能够最为彻底地体验人生的美好……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与我们渴望获得的事情却很难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所从事的职业并不见得符合我们的人生理想,于是便有了异化劳动;我们所打交道的职业伙伴并不见得与我们情投意合,于是便有了人际摩擦;我们的家庭配偶并不见得是我们的理想伴侣,于是便有了情感纠纷……仔细想一想,我们生

活中的许多不幸都来源于上述三者之间的矛盾。反过来说,只有那些把三者结合起来的人,才是幸福的。

因此,在我看来,一个人幸福与否,并不等同于他的生活质量,而是取决于他将事业与职业统一起来、将友谊与同事统一起来、将爱情与婚姻统一起来的程度。说得通俗一点儿:第一,就是当你爱干的事儿、你能干的事儿和社会需要你干的事儿是同一件事儿的时候,你才是幸福的!所以,我时常奉劝那些行将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不要人云亦云地选择职业,而要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出发,选择社会所需要的工作,把事业与职业统一起来。第二,就是当你愿意合作的人、你能够合作的人和社会需要你合作的人是同一类人的时候,你才是幸福的!所以,我时常奉劝那些行将踏入社会的年轻人:要注意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宽容别人的缺点,最好把你的上级领导、合作伙伴、谈判对象、竞争对手都变成你的朋友,那样你就会减少很多烦恼。第三,就是你爱的人、爱你的人和社会允许你们相爱的人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你才是幸福的!所以,我时常奉劝那些寻找对象的年轻

人:要勇敢地追求和珍惜难得的爱情,而不要仅仅满足于门当户对、结婚生子。

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第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爱干的事儿未必是我们能干的事儿,比如五音不全的我却偏想当一个歌唱家,那是不现实的!我们能干的事儿也未必是社会需要我们干的事儿,比如我很想当一个总统并自信可以管理好一个国家,但那也是不现实的!第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愿意合作的人却未必是我们能够合作的人,这种困扰从我们上小学期间的分班、排座位就开始了。不仅如此,社会需要我们合作的人却未必是我们愿意合作的人,比如我很讨厌我的老板,却又不得不在其手下工作;我很讨厌我的客户,却又不得不与之周旋。第三,在现实生活中,你所爱的人又不见得爱你,而爱你的人又不见得你爱!在茫茫人海中,要找到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几率本来就很低,而当他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社会又不见得允许其相爱,于是便有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不幸……如此说来,人要获得幸福,比提高生活质量还难!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中问答

问余何事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蒨斋语语】

第一次读李白的这首《山中问答》诗,当读到“笑而不答心自闲”一句的时候,不由会心一笑。笑的同时,眼前浮现李白那笑而不答的模样和神情——几分调皮,几分自得,几分神秘,十分可爱而且可亲。读诗而会心一笑的感觉真好。前此也常有类似情况。印象深刻的一回,是第一次读唐人张打油的《雪诗》:“江山一笼统,井上黑

【蒨斋赏诗】

人能淡泊心始闲

——读李白《山中问答》

□于冠深

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两回笑的内涵,多少有些不同。

“笑而不答心自闲”一句,真是写得太好了。就中“心自闲”三字是全诗的中心或曰诗眼。其他的二十五个字,都是围绕着“心自闲”落笔,起辅助烘托作用。正是“笑而不答”一语,极其传神地抒写、描摹了诗人“心自闲”的那分闲云野鹤般的悠然。“问余何事栖碧山”,应该说也是一句闲问。面对这样的闲问,因为闲,所以笑。唯其笑,反映闲。答问,固然不影响其心之闲;不答,也许更加显示其心之闲——闲得懒于作答。至于“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则是“心自闲”的典型环境了。

闲有两种。不忙,也就是无事可做或不去做事,即通常所说的有着空闲的时间,所谓身闲。这是一种。另一种是就心态而言,跟做事不做事关系不大甚或没有关系,即通常所说的心静、少有挂碍,是谓心闲。

一般说来,身闲是有利于做到心闲的。但有些人却在身闲的时候,甚至恰恰是因为身闲,心反倒不闲或更加不闲了。比如,由闲而生出来失落感,而空虚,而焦灼,而怅惘,而愤懑,等等。心闲的状态也就是适意或意适的状态。我曾写过这样的四句话:“动自逸兴飞,静亦有深趣。神仙无觅处,意适差相似。”动也好,静也好,不别扭,不勉强,不忧愁,不惶惑,心里轻松、舒泰、悠然、自在,一言以蔽之,曰:没有负面情绪。心闲是一种境界。心闲难得。

或曰:悠闲是幸福的最高品位,时下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在我看来,说悠闲是幸福的高品位之一,也许更妥当些。不去管它也罢。这里想再说的是,做到心闲亦即心态悠闲的不二法门,大概就是修炼一份比较阔大的胸襟和淡泊的志趣,别太计较个人名利与个人恩怨。君不见,有些人的心里,一天到晚放不下官位的能否升迁,或人民币能否更多汇聚,或谁谁对我如何如何,背着包袱,结着疙瘩,窝着嫉妒,埋着炸药,无论如何是闲不下来的。

论者有谓,愤世嫉俗同乐观浪漫,往往奇妙地统一在李白的作品中,故李白写“非人间”之碧山的美,意在同“人间”即当时的黑暗现实和自己的遭遇对比,所谓“心自闲”,也就未必是真“超脱”,而是隐含着诗人的伤和恨。好像有理。但我不赞同这样的看法。

在我看来,至少李白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或这首诗里的李白,确实是“心自闲”的,假如落笔的当口,他心里正憋着伤和恨,哪里会写出这样的句子来?唯其如此,我说,读《山中问答》,我们还是应体味李白心态的那一分悠闲。

人生在世,欲求什么时候都心呈悠闲状态,是不可能的。加强自我修养,尽可能多地把心态放闲,则是应该和可以做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幸福的多寡,确实取决于心态悠闲的多寡。我相信,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心态应该都是悠闲的。

(本文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出版《苔痕上阶》、《草色遥看》等多部著作)

郑板桥的润格与人格

没想到,在三绝之外的书画润例中,又让这位才子的率性与真趣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体现。



润格,又叫润例、润约、笔单等,指为诗文书画所定的报酬标准。与古今书画家的润格相比,郑板桥67岁时自定的书画润例,可谓别具一格,独步古今。

郑板桥(1693-1765)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诗书画三绝,也是“扬州八怪”中艺术成就最高、社会影响最大者。然而,郑板桥在政治上并不得志,61岁那年(1753),他因为民请赈而得罪大吏,从一生中做的最大的官之一——潍县知县任上辞官回乡了。自此,在扬州度过的最后13年里,郑板桥又过上了以卖书画为生的日子。重返扬州当画师的郑板桥当时已名满天下,求书索画者络绎不绝,让他疲于应付。67岁那年(1759),他听从老友拙公和尚的建议,自书润例,遂成为一段家喻户晓的人间佳话。原文录如下: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书

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犹恐赖账。年老神疲,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容。板桥郑燮。

润格有三层意思:开门见山,点明了不同尺幅、不同制式作品的不同价格;第二层意思说,别给我送礼,您送的东西我不一定喜欢,不如直接给银子好。我只对钱感兴趣,见到钱心里就高兴,写字画画就好,这样您才有可能收藏到我的精品;第三层意思说,我不收礼,更不赊欠,而且年纪大了,也没有精力陪您说那些无聊的话。总之,您给钱,我就给您写字画

画,别的免谈。

这段文字虽然直率,但毕竟是只从自己角度讲的,略显生硬。故又附诗一首,强调买家与卖家之间的两厢情愿,以化解其尴尬。这首诗表明了板桥老人的决绝态度和耿介性格,仔细品味一下,着实令人忍俊不禁。大致意思是说,您买我画的竹子可比买真竹子贵多了,我画在六尺宣纸上的竹子就卖三千(当然这个三千不是实数,因为与上文“大幅六两”的定价相矛盾,只是为了诗韵的需要而已)。你若买真的竹子,还不知能买多少呢!但是您既然看好了我的货,那就买好了,叙旧、套近乎,我也只会当成耳旁风。

这当然只是板桥润例的字面的意思,按我的解读,个中还有几层深意:其一,此时的郑板桥,名声与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不再是那个“卖与东风不合时”的“二十年前旧板桥”了,当年不被扬州人重视,现在自然也就不愿与他们“论旧交接”了。其二,买书画者多为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钱不要白不要。其三,郑板桥的所谓“六分半书”,也并非其得意之作,这种标新立异的形式,也无非是为了满足达官显贵们附庸风雅的心理而创造出的一个市场品牌而已。在这一点上,我十分赞同简直先生《书从天来》中的观点。

有人根据史料中当时的米价记载,推算出当时郑板桥书画的实际价值,认为郑板桥一幅价值六两的大画,

只能买到150公斤米。这个价位,与现代的一些书画家相比,可以说还是相当物有所值的,可见郑老先生并不“黑”。然而,按照传统,文人书画家是羞于谈钱的,而郑板桥的润格只谈“钱”字,不论其他,不但没有遭人讥讽,反而成了雅极而俗又俗极而雅的润格典范。除去当时书画市场的因素外,郑板桥的才华和高尚人格魅力还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清人张维屏在《松轩随笔》中说:“板桥大令有三绝:曰画,曰书,曰诗。三绝之中有三真:曰真气,曰真意,曰真趣。”没想到,在三绝之外的书画润例中,又让这位才子的率性与真趣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体现。

对于这个润例,至少对那些附庸风雅的人来说,郑板桥是严格遵守的。传说当时江西有位张真人,入京朝见乾隆后路过扬州,当地商人竞相逢迎,定做了长丈许、宽六尺多的大纸,想请郑板桥为其写一副对联。偌大的尺幅远远超出了郑板桥“大幅六两”的范畴,又要为其撰联,故郑板桥开价一千两。商人杀价到五百两,板桥欣然应允,顷成上联:“龙虎山中真宰相”。商人请写下联,板桥笑道:“五百两只能写一半。”商人只好如数奉上,郑板桥挥毫写出下联:“麒麟阁下活神仙”。文书俱美,商人连连拍手称妙。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